

A stylized map of Taiwan is the central focus, rendered in a light purple color against a dark blue background. Overlaid on the map are two faces in profile, facing each other. The faces are drawn with thick black outlines and have large, expressive eyes. A network of black barbed wire is superimposed over the map, crisscrossing between the two faces.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graphic and evocative.

台湾少年之歌

TAI WAN SHAO NIAN ZHI GE

梁学政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设计：陈 达 林
插 图：韩 伍

台湾少年之歌

梁 学 政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8 5/8 印张 154 千字

196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79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01—120,000 册 定价 0.49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本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五十年代初的台湾。

在台中市，有一个共产党员被美蒋特务逮捕杀害了，遗下一个孤女，叫任阿妹。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共产党地下组织把任阿妹送到基隆，暂时寄住在一家渔民——林姨的家里。

林姨有五个儿子，大的两个——大森和大草因为参加“二·二八”起义，被国民党逮捕了，家里留下三个小的——阿弃、阿民和阿虎。任阿妹住在林姨家里，了解了渔民的痛苦生活和他们迫切盼望解放的心情。她和林家的三个孩子成了亲密的朋友。

后来，阿民被美国特务的汽车撞死了。阿弃一心要为弟弟报仇。他和阿妹一起杀死了一个美国鬼子，还去爆炸美国运来的军火。

一天晚上，大草突然回来了，一家人都很高兴。没想到大草已经叛变了，他是回来搜捕越狱逃跑的大森的。阿妹发觉了大草是个叛徒。这时候，共产党地下组织把阿妹接回去了。阿弃和叛徒大草发生了冲突，结果被捕了。

阿弃在敌人的拷打下坚强不屈。他在监狱里找到了他日夜想望的共产党员。最后，他和一个共产党员一同被押上了刑场，地下组织设法把他们救了出来。阿弃终于又见到了阿妹，两个人从此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革命斗争。

第 一 章

一九五三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台湾省台中市的火车站上，旅客们正在月台上等着上车。太阳从头顶上直射下来。天气非常闷热，一点儿风也没有。槟榔树[bīng láng shù]的大叶子纹丝不动。

火车站上充满了闹嚷嚷的叫卖声。挎着[kuà zhe]篮子的小贩在人群中挤来挤去。

有几个小贩，他们卖东西的时候留心观察着每一个主顾。看到模样诚实的工人、农民或学生，他们就把藏在篮子底的纸抽出一张来包东西。当把纸包交给顾客的时候，他们悄悄地说：“拿回去看看吧，好消息！”

顾客会心地瞥了一眼手上的纸包，赶紧把它塞进口袋，兴冲冲地走开了。

那不平常的包装纸是一张张传单。传单上面说：美帝国主义者纠集了十几个仆从国家侵略朝鲜，妄图摧毁朝鲜北部的人民民主政权，进一步进犯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三年的战争，美国强盗完全失败了，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打得头破血流，终于被迫在停战

协定上签了字。

这消息飞快地在群众中间传播开去，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呀！

各种各样的小贩在火车站上兜揽〔dōu lǎn〕生意。银元贩子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故意把手里的“大头”（印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碰得“叮叮当当”响。兜售家禽的小贩手里拎着〔līng zhe〕活鸡活鸭。鸡和鸭都扑腾着翅膀挣扎，“叽叽嘎嘎〔gā gā〕”地乱叫。鱼贩子挎着腥臭的篮子，冲着行人大声吆唤：“鲜鱼贱卖啦！上好的鲜鱼呀！”“呜哇……”不知谁的孩子哭了起来，加入了这嘈杂〔cáo zá〕的大合唱。

天气闷热，加上臭味，加上喧闹〔xuān nào〕，使人心里烦躁。

可是这时候，车站上有一个人却怀着另外一种心情。他像意外地拾到了一张中了头奖的巨额彩票，正悄悄地站在人群里，在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让自己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欣喜〔xīn xǐ〕的神色。他是国民党台中特刑队的“三十六号”特务。

“三十六号”今天感到分外侥幸〔jiǎo xìng〕。他已经钉住了共产党台中市地下组织的一个干部，还有这个人带着的一个小姑娘。

中国共产党台中市地下组织出了一个叛徒。他出卖了信任他的同志，使地下组织遭到了局部的破坏。一个姓任的老共产党员被捕了，还有几个共产党员也因此暴露了身份。

从姓任的老共产党员的口中，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敌人用酷刑来威胁他，用金钱美女高官厚禄来收买他，结果都枉费心机。老共产党员最后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由于他守口如瓶，坚贞不屈，另外几个共产党员虽然暴露了身份，却一个也没被敌人捉到。他们发现了叛徒的行径以后，立刻隐蔽起来了。敌人只知道其中有一个是共产党台中市地下组织的领导干部，此外还知道，被他们杀害的姓任的老共产党员，遗留下一个十五岁的女儿。

敌人在全市疯狂搜索，并且在各交通要道上加紧检查，企图抓住那几个共产党员和那个老共产党员的孤女。特务机关内部悬出了重赏：捉到一个共产党员，一百两黄金；捉到共产党台中市地下组织的那个领导干部，二百两黄金；捉到那个姓任的小姑娘，也是二百两黄金。狡猾的敌人以为：孩子总比共产党员好对付，捉到了那个小姑娘，一定能从她口中骗出不少材料来。

半个月过去了，敌人仍旧连个影子也没找到。那几个共产党员和那个小姑娘，都好像突然从大地上消失了。

特务们像猎犬似地嗅遍了台北市的每一个角落。发财的迷梦，使他们看到了什么都觉得可疑，可喜。可是最后，他们得到的全是一样——失望。

“三十六号”在一个非常偶然的会里，探知今天下午一点整，那个共产党台中市的负责干部，将要带着姓任的孤女，离开台中到北线去。这个线索是怎么得到的呢？“三十六号”既不肯告诉他的同伙，也不肯报告他的上司。这是

四百两黄金哪！“大二百两”加“小二百两”！他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开满酒馆和妓院的南町，立刻赶到火车站上。

“三十六号”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挤得浑身臭汗淋漓。平常，“三十六号”总是气势汹汹[qì shì xiōng xiōng]的，谁挡了他的路，他就伸手一巴掌。今天他却不敢这样。他认为今天必须暂时忍着点儿，万一跟人家争吵起来，引起了那个共产党员的注意，要到手的四百两黄金，就可能一下子又溜跑了。

“三十六号”凭着“猎犬”的敏感，终于在拥挤的人群里找到了他的目的物——“大二百两”和“小二百两”。啊，四百两黄金！他的心“怦怦”地跳起来，真想立刻向这“四百两”扑过去。可是他打好了主意，决定不在这里进行逮捕。这里布满了他的同伙，他们一插手，就要分享他的四百两黄金了。而且为了显示逮捕过程的曲折和艰难，显示自己的机警和能干，他决定钉上“大二百两”和“小二百两”，在下车的时候再逮捕他们。他不信他们能溜掉。他想：“在这天罗地网密布的台湾，落到了我的眼里，想抓还不容易，就像老鹰抓小鸡似地，只要爪子一捏[niē]就行了！”

“三十六号”悄悄地，但是紧紧地钉住了他们。“大二百两”穿着一身白纺绸的短便衣，戴着顶细致的草帽。他中等身材，躯体有点儿发胖，一只手拿着把黑折扇，一只手牵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小二百两”。小姑娘穿着一件淡黄色的绸旗袍，脚上是雪白的镂空皮鞋。

“大二百两”似乎并没发觉有人钉上他们了。他好像故

意装得很神气，又开了两条腿，挺出了圆圆的肚子。他手上的那把黑折扇，有时候被打开扇两下，一会儿又被不耐烦地折了起来。

“一点不错，就是他。”“三十六号”在心里对自己说，“中等身材……体格结实……经常化装成各种身份的人出现……二十年中曾三次越狱，受过种种酷刑……是一个老牌共产党员！……哼，二百两黄金逮捕这么个大脚色，太便宜了。……这批吝啬鬼(lìn sè guǐ)！还有什么队长、小队长、特派组长，他们要是照旧一层一层克扣下来，这四百两落到我手上，谁知道还能剩多少！这次我可饶不了他们，我抓住他们的把柄，就上报总统(就是蒋介石)。这个案子，听说总统要亲自审问哩！到那个时候，我‘三十六号’可不是现在这样子了。……免崽子(tù zǎi zi)，你们会坐小汽车娶姨太太，难道我就不会了！……”

“三十六号”正在心里臭骂他的上司，火车进站了。

车站上一阵混乱，下车的人往外跑，上车的人往里挤，人人都像害怕自己会被摺(liào)下来似的。可是不管多么混乱，“三十六号”还是紧紧地钉住了“大二百两”和“小二百两”。

“大二百两”带着“小二百两”上了头等车厢。头等车厢票价很贵，乘客不多。车厢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女招待员过一会儿就来喷一次香水。当然，这笔开销早已加了几倍打在票价里了。“大二百两”和“小二百两”找了两张靠窗的

皮椅子，面对面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

“哼，果然狡猾！看你们这回还往哪儿跑！”“三十六号”心里咕哝着。他走到“小二百两”的斜对面，挨着坐在“大二百两”旁边。

火车出了站，愈开愈快了。头等车厢没满座，车厢里相当安静。那一头，四个有钱的阔佬凑在一起打桥牌，偶然说上几句话。有的人在喝啤酒和可口可乐，有的人在打瞌睡。和“小二百两”并排的那张皮椅子上，靠着另一边的窗口坐着一位中年人，嘴里衔着雪茄烟，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美国杂志——《LIFE》（《生活画报》）。

特务的职业习惯，使“三十六号”注意起那个人来。那个人约莫四十几岁，肩膀很宽，脑门微向前凸，头上戴着一顶精致的巴拿马草帽，身上是一套淡灰色时髦〔shí máo〕的西装，脚上穿着一双咖啡色的尖头皮鞋。他并不看杂志上好莱坞女明星半裸体的大幅照片，却在专心致志地读一篇文章。文章讲的是什么呢？“三十六号”无从知道，他看不懂那些印得密密麻麻的像蝌蚪撒欢似的英文。“三十六号”不由得叹了口气，不懂得英文，正是他在特务机关里不能飞黄腾达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个‘尖头鳗’（英语‘绅士’的读音）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三十六号”从斜对面打量着那个中年人，心里不断地思忖。“看他身上那套华贵的衣着和脸上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气，一定是个才从澳洲或者南洋群岛回来的华侨，说不定还是个腰缠万贯的财主。”想到这里，“三十六号”不由得心

十乙十乙十乙十乙十乙十乙十乙十乙十乙十

里发痒。“哼，要不是今天有紧要任务在身，我一定得好好敲他一笔竹杠，把他这个‘尖头鳗’弄成个‘秃头鳗’！也好叫这些在海外发了洋财的华侨，知道知道台湾这块地皮不是容易踩的！”

查票员来了，他把所有乘客的票都剪了。“三十六号”的是长期票，查票员看了一看就还给了他。车厢里又静了下来。女招待员来兜售糖果、点心和画报。打桥牌的阔佬们把她叫过去了。从车厢那一头，传来一阵令人恶心的狂笑。

“三十六号”很不高兴，因为那个女招待员没有首先来侍候他这位当代英雄。没想到“大二百两”倒赶在他前头发起火来。

“来人！喂！来人！”“大二百两”拍了一下桌子，大叫起来。

女招待员急忙跑过来，陪着笑脸问：“先生，您要什么？”

“茶！！”“大二百两”瞪着眼睛嚷。

茶立刻送来了，一共四杯。女服务员小心翼翼地把第一杯放在“大二百两”前面的桌子上，第二杯递给了“小二百两”。她正要转过身来把第三杯送给“三十六号”，忽然“啪”地一声，茶水溅了“三十六号”一裤腿。

原来“小二百两”接茶杯的时候自己不小心，把热茶泼掉了半杯。“三十六号”还没发作，“大二百两”倒大发雷霆[léi tíng]了。他借题发挥，冲着女服务员就骂：

“妈的！眼睛长在哪儿了，也不看看是什么人！”

“三十六号”倒觉得好笑起来，他心里说：“别装腔了，你是什么人，能瞒得了我。”

女招待员这时候早怔住了。她只怕打破饭碗，怎么敢和头等车厢里的乘客争吵。“大二百两”一边骂，一边挥起手来，朝女招待员脸上打过去。但是他的手还没落下来就被人挡住了。“三十六号”抬头一看，拦住“大二百两”的，是方才看《LIFE》的那位绅士。

“有话好说嘛，何必打人呢？”那位绅士的口气很温和。

“是嘛，用不着发火！”“三十六号”正想搭腔，就随声插上去说。

女招待员放下茶杯，双手掩着脸，乘这机会跑出去了。

“大二百两”打量了一下那位绅士，又扫了“三十六号”一眼，忿忿地(fèn fèn de)坐了下来。“三十六号”搭讪(dā shàn)说：

“老兄，别和这种臭女人计较。等会下了车，我陪你去找站长，叫他好好地教训教训她。老兄在哪个站下车？”

“大二百两”却不屑理他，扭头去看窗子外边。倒是那个“小二百两”娇声娇气地回了他一句：

“台北，我们在台北下车！”

“三十六号”用手弹了弹裤腿上的水珠，心里骂着：“真他妈的，我今天算是忍啦！大姑娘坐花轿，头一遭儿。人家都说共产党会打掩护，今天算叫我真的领教了，这回看你再往哪儿跑。只要一到台北，哼！四百两黄金，四十根



黄灿灿的大条子！……”一想到黄金，他脸上泛起了得意的笑容。

这时候，那位绅士回到自己的座位旁边，点燃了一支雪茄烟，从容地向车厢那一头的厕所走去。

“三十六号”完全失眠了，这位绅士才正是特务们疯狂搜捕的对象，——中国共产党台中市的一位领导干部。他姓刘，大家叫他刘叔。而特务们搜捕的另一个对象，——那个老共产党员的孤女任阿妹，这时候却坐在三等车厢里。

刘叔在台中车站就发觉了“三十六号”，看到他贼眉鬼眼地钉上了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副书记长。刘叔非常了解这个党棍，他叫钱先强，外号“钱包”，这是带着他的女儿从阿里山别墅(bié shù)回台北去。“三十六号”这个财迷恰巧撞在这个“钱包”上。刘叔无心欣赏这出正在演下去的滑稽丑剧。他走到厕所门前，回头看看“三十六号”并没有注意他，就匆匆地穿过一节车厢，又穿过一节车厢，来到三等车厢里。

三等车厢里人很拥挤，弥漫着恶浊的香烟味，叫人头昏脑胀。药贩子站在座位上，声嘶力竭地推销着什么大补丸。火车开得很快，风在窗口掠过，吹不散车厢里叫人昏昏欲睡的闷热。

在车厢的角落里，刘叔找到了他的老同志遗留下来的孤女——任阿妹。这个浅棕色皮肤的女孩子，正和一位带着六个小孩的胖大娘坐在一起。最小的那个孩子拉了一尿片屎。任阿妹低着头，在帮胖大娘细心地给孩子收拾。

“谢谢，谢谢，”六个孩子的妈妈连连说，“真对不起。”

“没有什么！大家都是出门人。”阿妹笑着说。

“你真像我们的大姐姐。”一个孩子说。

“那你们就叫我大姐吧。”阿妹的声音非常亲切。

“孩子多，出门真不方便！”那位胖大娘叹着气说，“待会儿车到了站，还不知道怎么下去哩。”

“您放心。”阿妹说，“到了台北，我送你们出车站。”

“真是谢谢了。亏得遇着了你。”胖大娘感激不尽地说。

阿妹抬起头来，看到刘叔正经过她旁边，不由得脸颊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一双黑黑的眼珠微微流露出一点儿慌张。刘叔向她会意地点了点头，若无其事地走过去了。

阿妹转过头去，又跟胖大娘说起话来。

“多好的孩子呀！”刘叔心里想着，又穿过一节一节的车厢，好像要买什么东西而没有买着似地，回到了头等车厢里。他正要在那张靠窗的皮椅子上坐下来，发觉手里的雪茄烟熄了，就故意凑到“三十六号”跟前，借个火点着了烟。他嘴角挂着微笑，冷冷地向那两个丑角看了一眼：“钱包”的气还没消，“三十六号”脸上可喜孜孜的〔xǐ zī zī de〕。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拿起《LIFE》，不经意地翻了几页，又抛在一旁了，两只眼睛悠闲地望着窗外的景色。

远处是巍峨的〔wēi é de〕山峦〔shān luán〕和黑黝黝的〔hēi yǒu yǒu de〕茂密的森林。甘蔗林长得比人还高。近处是金黄色的稻田，一年收两次或三次的稻子又成熟了。三五成群的农民正在收割。他们衣衫褴褛〔lán lǚ〕、精神

疲惫〔pí bèi〕。有时候，天边出现一角蓝色的海面，还可以望见点点渔帆。台湾是多么美丽，多么富饶呀。但是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劳动人民却在饥饿贫困中挣扎。

“多好的孩子呀！”阿妹那恬静的〔tián jìng de〕小圆脸又出现在刘叔的眼前。这孩子的阿爸和阿妈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刘叔多年的战友。六年前，阿妹还只有九岁，她的阿妈在“二·二八”起义中牺牲了。这一回，她的爸爸又被国民党逮捕，而且遇害了。刘叔还没有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阿妹。他知道敌人像猎犬似地正在到处搜捕他和这个老同志遗下的孤女。再在台中待下去太危险了，组织上决定叫他转移到台北去，同时把阿妹送到基隆，让她暂时寄住在一家诚实可靠的渔民家里。这个失去双亲的孩子就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mò shēng de〕地方，去过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了。她能独自应付自己的生活吗？她会坚强地成长起来吗？“会的，一定会的。”刘叔在心里对自己说，“她一定会成长为一个像她阿爸阿妈一样坚强的战士。”

落日用绮丽的〔qǐ lì de〕光辉涂抹在大地上，一会儿，苍茫的暮霭〔mù ǎi〕升起来了。火车渐渐慢下来，到台北了。

火车一停，旅客就争先恐后地挤下车去。车站上乱糟糟的。许多人抢着拥上了天桥，也有的就从铁轨上跑过去，站上的路警并不阻拦。到了出站口，人群被挡住了。路警挥着棍子，要大家排好队，一个挨一个出站去。十几个宪兵挨个检查旅客的行李，甚至摸旅客的身上。

刘叔望见阿妹帮那个胖大娘领着六个孩子，也排在旅客的队伍里。忽听得背后一声吆喝，他回头一看，只见那个“三十六号”一个箭步窜到“钱包”跟前，挥起手来，“啪，啪！”给了“钱包”两个耳光，顺手还打了他的“千金”一巴掌。

“妈的！跟我走！”

“三十六号”大声喊着。他一只手紧紧扭住“钱包”的衣领，一只手伸到腰里去掏手枪。“钱包”急忙把绸褂子一撩。“三十六号”看见“钱包”腰里也别着一把手枪，比他的那支还要小巧。他立刻像鸚子〔yào zi〕捕鱼似的，双手来抓“钱包”的手枪。

“钱包”气昏了，他左手按住腰里的手枪，挥起右手，狠狠地给了“三十六号”一连串的耳光，嘴里骂着：

“你反了！你明抢！”

“你是共产党！”“三十六号”一边护住自己的脸，一边叫。

“你才是共产党！”“钱包”气焰更高。

“来人哪，别叫他跑了！”“三十六号”死命扭住“钱包”不放，就像一个乞丐在梦里抱住了拾到的金元宝一样。

“我是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书记长！”为了吓唬对方，“钱包”把“副”字也扔掉了。

“你冒充！”

“我是搞党务的，等会毙了你！”

“随你什么‘务’也不行。一会儿……一会儿就叫你知道我是谁了！”“三十六号”差点说出自己是特务来。

两个人扭成一团。许多人围上去看热闹。刘叔可没有耐性把这出丑剧看完。他走出车站，远远地看见阿妹把那个胖大娘和六个孩子送上了三轮车。

天渐渐黑下来了。商店门口亮起了五光十色的霓虹灯[ní hóng dēng]，准备迎接繁忙的夜市。那些达官富商家的太太小姐，都到晚上才出来逛街买东西，或是上酒楼舞厅去享乐。她们的生活是颠倒的，总把黑夜当成白天。

在广场的一个角落里，刘叔和阿妹碰头了。刘叔轻轻地抚摩着阿妹的两条辫子，满意地笑起来。

借着昏黄的路灯的光，阿妹抬起头来望了望刘叔。不知为什么，她的心这时候突然“怦怦”地跳起来。就在这里，她要 and 几天以来日夜相依的刘叔分别了，为了安全起见，将要由另一个同志把她送到基隆海边上。临别的依依不舍的心情，突然袭上她的心头。

“我的住址，你记住了么？”刘叔悄悄地问。

“记住了！”阿妹轻轻地回答。

其实，刘叔暂时还没有固定的住址。阿妹知道，刘叔所说的“住址”，实际上是指将来派人来接她时的联络信号。刘叔告诉她，情况如果没有意外变化，两三个月内一定派人来接她。

刘叔看了看手表，离约定的时间还差十分钟。他并不焦急。他相信，黎爽只要接到通知，一定会准时赶到的。……不过这次联系得过于匆促，她会不会没接到通知呢？会不会轮船上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她没法抽身呢？……如果